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译与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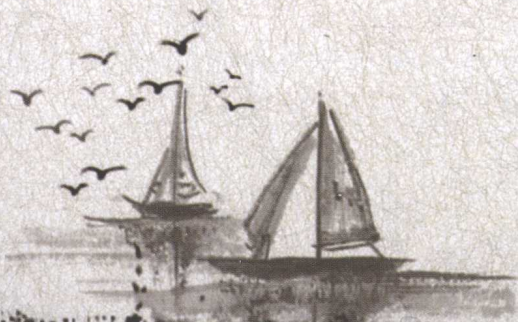
Translation and Difference

——林乐知译述与西学传播

卢明玉 著

Young J. Allen:
His Translation and
the Spread of Western Learning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Translation and Differen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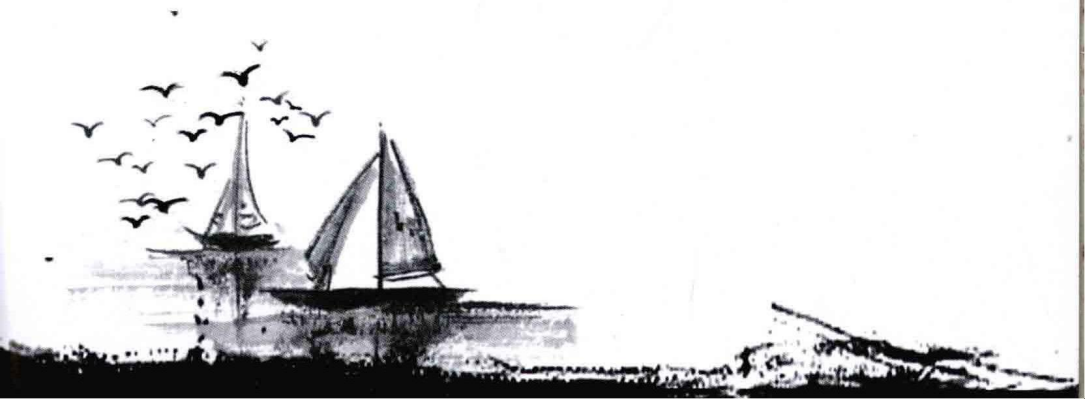
译与异

——林乐知译述与西学传播

卢明玉 著

Young J. Allen:
His Translation and
the Spread of Western Learning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译与异:林乐知译述与西学传播/卢明玉著. —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0.6

ISBN 978 - 7 - 5638 - 1824 - 2

I. ①译… II. ①卢… III. ①东西文化—文化交流—研究—中国—清后期 IV. ①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96034 号

译与异——林乐知译述与西学传播

卢明玉 著

出版发行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红庙(邮编 100026)

电 话 (010)65976483 65065761 65071505(传真)

网 址 <http://www.sjmcb.com>

E-mail publish@cueb.edu.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服务部

印 刷 北京泰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10 千字

印 张 7.625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638 - 1824 - 2/K · 8

定 价 19.00 元

图书印装若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林乐知与近现代中西文化交流

(代序)

卢明玉博士的专著《译与异——林乐知译述与西学传播》即将付梓,这无论是对作者个人而言还是就翻译研究界而论,都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进入 21 世纪以来,国内高校几乎每年都有若干位青年学者选择以近现代西方来华传教士的翻译活动为研究课题,撰写博士论文或者硕士论文,不断拓展翻译研究的视野和疆域,弥补以往研究的空白或薄弱环节,并取得了一系列可喜可贺的研究成果。从研究对象的重要性以及整个研究工作所取得的进展来看,《译与异——林乐知译述与西学传播》应当说是此类课题中一部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追溯历史可以发现,从 19 世纪初叶到 20 世纪初叶约一个世纪的时间,是西方传教士来华人数最多的时期,由此也极大地推进了中西文化的接触与交流。从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 ~ 1834) 1807 年受伦敦会派遣来华,至 1907 年美国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 1836 ~ 1907) 在上海辞世,恰好是一个世纪的时间。其间,西方各国来华传教士的数量逐年递增,尤其是在鸦片战争之后,人数增加尤为显著。迄今为止,因为多种语言的历史文献尚未充分梳理,加之教派差异等各种因素,尚无来华传教士人数的确切统计,但一般认为数量当以万计。数以



万计的来华传教士构成当时中国社会中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凭借自身拥有的多元化的文化资源、经济资源和诸多方面的社会资源及影响力,成为这一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一支主要推动力量和重要媒介。

在上述传教士之中,人才济济,许多人为中西文化交流与融合做出了重要贡献。马礼逊 25 岁来华,在华宣教和工作 25 年,其标志性的翻译成就为首次将《圣经》翻译为中文出版,编撰了第一部英汉词典《华英字典》,并率先将《三字经》和《大学》等中国传统典籍翻译为英文,在《圣经》的传播、英汉双语词典编纂以及中国典籍英译等方面都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在中西双方对后世的影响都颇为深远。林乐知 24 岁携带妻子和刚刚出生 4 个月的女儿举家来华,从事传教、翻译、办学、出版刊物等工作,长达 47 年之久,其标志性的翻译成就包括《文学兴国策》、《格致启蒙博物》、《格致启蒙化学》、《格致启蒙地理》、《万国史》、《欧罗巴史》、《东方交涉记》、《列国岁计政要》、《译民主国与各国章程及公议堂解》、《列国陆军制》、《新闻纸》、《地学启蒙》、《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等数十种。此外,从广义的翻译的定义来看,他的翻译活动和成就还应当包括他 1874 年创办、1907 年停刊、在晚清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刊物《万国公报》(The Review of the Times)。马礼逊和林乐知不仅代表了上述历史时期的起始和终结,也是数以万计西方传教士中的典型代表,堪称中西文化交流进程中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引领者。

从翻译研究的角度而言,如果比较马礼逊和林乐知的翻译活动、成就及其影响,后者显然具有更为典型的学术价值和意义。选择对林乐知的译述进行探讨,犹如登山拾级而上,攀登到一个



制高点,由此俯瞰和考察近现代西学传播的活动,审视中西文化交流的发展进程,其学术价值和意义不言而喻。

作为一个较为系统化的研究课题,《译与异——林乐知译述与西学传播》一书的显著特点是尝试从西学传播的视角考察林乐知的翻译活动,在近现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性语境中解读他在长达近半个世纪内所宣扬和自己身体力行的翻译理念,分析其有代表性的译作,阐释其翻译策略和技巧,而不再像以往的研究那样将他锁定在传教士的身份上,仅从宗教传播的角度审视其翻译思想与翻译活动。翻译活动的核心在于译者,因此该书首先从剖析林乐知作为译者的成长和嬗变入手,较为全面而深刻地分析了这位寄居中国47年的西方人的多重文化身份。与其同时代同样致力于中西文化交流的其他西方人不同,甚至与其他单纯宣教的传教士也大为不同,林乐知寓华近半个世纪期间所从事的工作和活动极为庞杂,除了倾注几年的时间潜心学习汉语和研习中国经典外,还曾经为了养家糊口,充当掮客经商,贩卖棉花、大米和煤炭,还曾办学、教书、担任兼职编辑和翻译、办报、传教等。他与各地官商士绅往来频繁,过从紧密。诸如此类的经历,一方面使其身份构成颇为复杂,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使他较为广泛而深刻地了解和认识了中国各社会阶层的状况,更多地体味和领教了中国人的思想、价值观、传统、情感以及认知模式及其特征,构成了他译介西学的重要文化与心理基础。换言之,林乐知在华的生活与工作经历与其翻译思想、翻译策略与活动具有密切关系,也构成了他不同于其他传教士译者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上述基础上,《译与异——林乐知译述与西学传播》从林乐知的数十部译作中选择了三部具有广泛影响的典型译作进行个



案研究,即《译民主国与各国章程及公议堂解》、《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和《文学兴国策》,在解析译作不同主题内容的基础上分别阐释林乐知传播西学的指导思想、翻译策略与技巧、翻译方式与特点,以及译作所产生的影响。上述研究的特征是敏锐地把握住了林乐知所强调的中西文化之“异”,并由此长驱直入,淋漓尽致地透析林乐知如何认识和权衡中西文化诸多方面之“异”、如何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对其进行处理和表达,并以“因异而译”、“以译传异”、“异藏于译”和“化译为异”等章节的标题画龙点睛地彰显出这些特征,可使读者一目了然。书中对一些典型译例的分析和研究,也以实证的方式说明了林乐知如何在翻译和传播西学的过程中处理中西文化之间的“异”,以便在二者之间顺畅地进行沟通和交流。

例如,在《译民主国与各国章程及公议堂解》一书中,林乐知煞费苦心,想方设法在译作文本中调节中西国体的差异,试图通过在中文译本中建构新的词汇来弥合中西政体方面的差异,以便晚清中文读者了解、认同乃至接受西方民主的概念、民主的体制及其运作程序。1875年林乐知在《万国公报》刊行其译作《译民主国与各国章程及公议堂解》时,署名为“本馆”,以此显示此举并非是以译者个人的选择,而是《万国公报》以机构的身份强力推介。对于民主体制中作为国家政府首脑的“president”一词,林乐知选择的中文译名为“公举皇帝”,其中的“皇帝”体现了晚清乃至此前历代中国皇权体制中最高统治者的概念,而“公举”则是对世袭的“皇帝”及其国家管理体制机制予以温和的改革和限定,说明需要以西方民主投票的“公举”方式取代中国传统的世袭体制。当时,《万国公报》还曾使用“总统领”、“民主”甚至音译的“伯理



玺天德”作为“president”的中文译名,也都体现了林乐知和当时其他译者是如何小心翼翼地寻找既能传达民主理念又能为中文读者理解和接受的中文表达方式,尽可能弥合中西政体等诸多方面的差异。

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式不同,人文学科的研究并非以试验、数据以及相关分析为基础,而更多地依靠选择典型历史文化语境中的典型个案进行独到、精当而深邃的剖析和解读。如同上述对“president”一词中文翻译的分析,《译与异——林乐知译述与西学传播》一书在个案分析方面做了成功而有益的尝试,有力地支持了书中提出的林乐知译介西学的基本价值取向是“因异而译”、“以译传异”、“异藏于译”和“化译为异”等观点。此外,对于林乐知保持与远在美国的母会的联系,包括为其会刊(Wesleyan Christian Advocate)撰写文章,介绍他在中国宣教的成就与心得,以及叙述晚清政府和社会的特征与各种变化,本书论及的篇幅不多,但注意到了林乐知是致力于双向沟通中西文化,有别于晚清仅仅向中国传播西学的西方人士。

《译与异——林乐知译述与西学传播》作为一个系统性的主题性研究课题结果的出版发行,对于研究林乐知的翻译思想、翻译实践、译作文本以及由此而在晚清社会所产生的广泛、持久而深远的影响而言,应当说仅仅是一个较高起点的开端,大有可为的研究课题仍举不胜举,可以预见的研究空间也颇为宽阔。晚清的中西文化交流伴随着中国现代化艰难而曲折的进程,在此过程中林乐知作为具有特殊背景的译者/“他者”的所作所为,其活动的空间并非局限于书斋的翻译过程和译作的文本,并非局限于输入和传播西学,他同样致力于采用当时输入的“西学”作为参照,



审视晚清社会的儒教信仰、政府体制、管理机制与模式、官员的选拔系统、教育的定位与体制、学校的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等涉及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和方面,并进行评论,甚至批判,为除旧革新而进言,在更为实际和直接、更为深刻的层面推进中西文化的交流和融会以及社会现代化的进程。凡此种种,都可作为翻译研究的课题。

总之,林乐知作为传教士自然有其宗教的夙愿和局限,但他在广义的翻译领域为传播西学、沟通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以及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所做的事情都远远超越了其宗教信仰的空间,其影响也远远逾越了宗教的范围,值得进一步的研究和批评。

刘树森

2010年1月20日



内容摘要

本书是对晚清传教士林乐知的译述与其西学传播的专题研究,采用的是历史研究和翻译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弥补了历史界忽视译著的文本分析和翻译界缺乏对译著的历史评价的缺陷。两种研究方法的结合既可揭示译著的历史价值,又可为历史评价提供确凿的文本依据。

对林乐知的译述与西学传播的研究是对晚清传教士的个案研究与专题研究。本研究探讨了林乐知的双重文化身份,旨在搭建他来华前后思想和活动之间的联系,加深对林乐知在华思想和行为特点及相互关系的认识,正视其中国情结并揭示他向西方介绍中国的史实;通过对林乐知从事翻译的缘起、汉语习得的经历、翻译方式及译论的考察,揭示其翻译特点和翻译观。本书以《译民主国与各国章程及公议堂解》和《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两个具体译本为例,采用翻译研究和历史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译本进行多层次、多视角的剖析,揭示林乐知译述与西学传播之间的关系;并以《文学兴国策》为林乐知西学传播的代表作,对原、译作之间的关联及其所体现的文本、文化关系进行系统研究。从西学传播和译述两方面,考察林乐知采用文化适应策略的目的、方法和影响,宏观地分析了以林乐知为代表的晚清传教士西学传播的背景、特点、影响和局限,并总结了西学传播的两种评价范式,给出新的评价。



本书就翻译和跨文化交流的关系作理论上的探讨,提出翻译文化史研究模式。依此模式,通过分析“因异而译——林乐知的双重文化身份”、“以译传异——林乐知的翻译与西学传播”、“透视译异——《文学兴国策》个案分析”、“异藏于译——林乐知西学传播的文化适应策略”、“化译为异——以林乐知为代表的晚清传教士西学传播”,对林乐知的译述与其西学传播的关系进行剖析,从翻译前提、翻译过程和翻译结果三个方面分别考察,揭示“译”与“异”的辩证统一关系。得出的结论是:翻译应民族、文化之需而生;反过来,翻译可改变原有文化,注入异质文化,对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产生作用;“译”和“异”二者之间相辅相成的同时又彼此相制,形成各自的局限性,这是晚清传教士翻译在中国翻译文化史中的地位、意义和局限所在。

林乐知的西学传播活动形式多样、影响深广,在晚清自由派传教士中具有代表性。通过对林乐知的个案研究,本书试图回答以下五个问题:

1. 晚清传教士为何在传教之外进行西学传播? 传教士因具有中西双重文化身份,又通过汉语习得克服了语言障碍,满足了传播西学的先决条件。加上受到倾向自由派传教方针的宗教运动的影响和寓华时久而生的助华救华的博爱之心,他们中的很多人像林乐知一样产生了引介西学以改造中国的想法。对比中西异同,分析华人需求,再基于扩大基督教影响的隐含目的,他们将其认为适合华人的西学引介了过来,即因异而译。

2. 晚清传教士传播了哪些西学? 通过分析林乐知对西方民主制度、妇女解放思想和西方近代教育制度的译介,可以揭示晚清传教士西学传播的内容主要集中在思想文化领域,以促进改



革、改造社会为目的,即以译传异。

3. 他们是怎样进行西学传播的? 分析以林乐知为代表的晚清传教士的西学传播活动和著述译论,发现文化适应策略多为他们所采用。采用该策略主要是利用中西文化相通相容的一面规避相异相斥的一面,以求在中国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西学传播易于进行,即异藏于译。

4. 主要意义何在,是怎样产生的? 化译为异:晚清传教士西学传播的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他们向华人敞开了西方文化的大门,将具有近代意义的西方科学知识、价值观念、制度风俗引进中土,对引介西方近代思想和沟通中西文化起到了开先河的作用,产生了星火燎原之势。这是中外社会历史、文化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传教士应晚清寻求救国良策的需求作出的尝试和回应。传教士对晚清出路的探索通过西学译介与华人救国出路探索的相互作用,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我们以晚清中国自强出路探索的历史视角评价传教士西学传播:它是晚清中国出路的一种探索;加快了华人对社会弊病的认识;引介了西学、西法;缩短了华人自我探索的过程;既是宣教的载体,又是其干扰者。

5. 有何局限,局限的根源在哪里? 晚清传教士西学传播的局限表现在三个方面:引介活动零散,缺乏系统的组织规划;引介的内容良莠不齐,译介的一流作品较少;传教士依据自己的判断和西方模式来引介西学,他们的译介与华人的切实需求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同时,华人对局外人的“给予”也会产生与本土精英的“自选”不同的接受心理。这些都导致传教士西学传播的角色后期被中国本土知识分子所取代。以上局限源于传教士的西学传播活动缺乏组织性,往往是各自为政;同时,他们摆脱不了自身



教育、学术水平的局限；再有，他们的双重文化身份在利于其沟通中西的同时，也因有此标签而成为西学传播的障碍，“译”和“异”之间相互制约形成各自的局限性，即译异相制。

最后我们要说：对晚清传教士的历史评价应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事而异，不可统而概之、失之偏颇。

关键词：传教士 林乐知 西学传播 译 异



Abstract

This book focuses on the translations and spreading of western learning by Yong John Allen, a missionary spending two thirds of his life in China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basic idea was to combine the studying methods of both history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The combining study method not only recovered the historical value of Allen's translations, but also provided reliable literary evidence for their historical evaluation, thus the disadvantages of either historical or translational studying method were avoided as much as possible.

Actually, the study on Allen's translations and spreading of western learning could be seen as a case study as well as a monographic study in late Qing missionary research. Firstly, by exploring Allen's bicultural identities and the relations in between, it studied how his thoughts and deeds in America and in China were connected, thus opened a way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features and relations of his ideas and activities in China. Also, his China complex and dedication to introducing China to the west were revealed. Secondly, it analyzed Allen's engagement in translating, his Chinese language acquisition, as well as the means, features and his viewpoints of translation. Thirdly, with the combining study method, it analyzed two works of his translations—*on Translating Democratic Nations*, *Consti-*



tutions and Parliaments of Various Countries and Women in all Lands, and revealed the relations of his translations and spreading of western learning spreading activities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Fourthly, by taking *Education in Japan* as a representative of Allen's works, it carried out a systematic investigation on the text-culture relations of the original and the translated. Fifthly, it studied the objectives, means and influences of Allen's culture adaptation strategy based on the analyses of both his translations and activities. Finally, it explored the backgrounds, features, influences and limitations of the late Qing missionaries' western learning spread, concluded two evaluation paradigms and tried to propose a new one.

Based on the study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translation and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 book proposed a mode to study history of translation culture. By the mode, it analyzed: translating out of cultural differences—Allen's bicultural identities; spreading difference through translation—Allen's translation and the spread of western learning; in view of translation and difference—case study of the translation of *Education in Japan*; difference hid in translation—the culture adaptation strategy of Allen's spread of western learning; turn translating into changing—late Qing missionaries' western learning spread represented by Allen. On the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Allen's translation and the spread of western learning, it studied the prerequisite, process and result of his translating, and exposed the relations between “translating” and “difference”. In the end, it drew the conclusion that translation is to meet the need of a culture or na-



tion; and in return, it can change the culture by imputing the cultural difference into it, thus impose influence on both the source culture and the translated culture; yet there are passive as well as active interactions between translating and differing, so limitations fell on each side. That is where the position, the significance and the limitation of Late Qing missionaries' translation lie on China's history of translation culture.

Allen was representative of the late Qing liberal missionaries, for his activities in China took various forms and exerted great influence on the society. Through the case study of Allen, we intended to answer the following five questions:

1. Why did late Qing missionaries spread western learning beyond preaching? Motivated by the liberal religion movement and the philanthropic love of Chinese people after long residence in China, many western missionaries came out with the idea of influencing and converting China by spreading western learning, which was made possible by their bicultural identities and acquisi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In order to spread Christianity, they introduced what they assumed beneficial for China based on their analysis of China's needs and comparison of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This is "translating out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2. What learning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Through analysis of Allen's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democracy, women's liberation and modern education systems, it could be seen that the western learning spread by late Qing missionaries mainly focused on ideology



and was oriented to initiate reforms and transform Chinese society. This is “spreading difference through translation”.

3. By which means did the missionaries spread western learning? On analyzing missionaries' western learning spread activities and their related translations,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y adopted the culture adaptation strategy in most cases. To avoid conflicts and emphasize similarities in cultural exchanges, this strategy blazed an easier way in spreading western learning. This is “difference hid in translation”.

4. What was the most basic contribution of their western learning spread and how did it come? Turn translating into changing. For the first time the doors of western culture opened up wide for Chinese people, which could be seen as the most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of the missionaries' spreading activities. Through their introduction of the western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alues and notions, systems and customs, the native Chinese came into extensive contact with the western culture and modern ideology. Since then, an ever-expanding trend of seeking knowledge from the west was in vogue. It was the result of the social,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s of the east and the west, the response to the call of the native Chinese seeking solutions to China's decay and ruin. It was the attempt and response made by western missionaries. Thus, through translating and introducing, the western missionaries' quest of solutions to China's decadence corresponds with the native Chinese's and demonstrated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hases. Therefore, from th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f Late Qing's self-strengthening efforts, mis-